

我国学术职业 整体水平亟待提高

本报记者 郝俊鲁伟

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厄内斯特·博耶(Ernest Boyer)曾有一句名言:学术职业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心脏”。而我国学术职业人的整体质量和水平,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大学教师的“职业精神和对职业规范、规律的认知还处于较低水平,需要重新建构”。

“学术职业”这一概念,在英语世界里已有近70年历史,在我国则还称得上是个“新鲜词”。英语国家学者将“学术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简要定义为“大学教师所从事的职业”。影响我国学术职业发生变革的驱动力有哪些?与国际相比较,我国的学术职业呈现出哪些特征?就上述问题,“学术职业国际合作项目——中国研究”负责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沈红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学术职业的变革力量

沈红的研究发现,在院校、学科和个人三个层面存在着深层次矛盾,是全球范围内影响学术职业发生变革的主要驱动力。对此,沈红给出了进一步解释。比如在院校层面,院校对自治权限的需求与自身治理能力的不足,使自治成为一把“双刃剑”;在学科层面,学术本身存在着保守性,然而知识却在不断地创新,同时,学科具有系统性但市场则是灵活的;在个人层面,教学和科研之间存在着张力,注重教师个人发展还是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学生发展,两者也难以平衡。如此这些,都使得学术职业发生变革。

对于我国而言,沈红认为,近些年学术职业变革的强大推动力,无疑是由高等教育扩张引发的。“规模的大扩张,如同洪水般地冲击、拍打着高等教育体系。尽管由于我在国外的感受深刻,因此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一直持正面评价,但不能不说,这种扩张引发了高等教育多方面的变革,学术职业变革正在其内。”沈红说。大众化是起因,它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力量,则同时作用于我国学术职业。在沈红看来,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同时促成了对保证教育质量的强烈要求,“既要规模,又要水平”。由此,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一股“评价的力量”。“在大学评价中,最重要的评价,自然是对教师所从事的学术职业的评价。”沈红说,“重规模”和“重评价”的结合,共同增强了行政力量的力度,而规模、评价和行政三者,对我国的学术职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学术职业人的特征

变革之中,我国学术职业呈现出哪些特征?通过国际调查项目,沈红研究团队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学术职业人的从业资格来看,与国际

相比较,在接受调查的人员中,我国拥有博士学位的大学教师的比例偏低。参与国际调查的19个高等教育系统,拥有博士学位的大学教师比例均值为56%,而我国相应比例仅为25%,位列倒数第二。这一结论,似与公众目前对于大学教师职业的直观感知不符。沈红强调,调查采样中包含了58所地方高校,同时,数据截止于2007年秋。因此,在总体上肯定是“冲淡了”博士学位拥有者的教师比例。年龄结构方面,我国学术职业人偏于年轻。接受调查者中,有近70%的大学教师处于40岁及其以下的年龄。除去中国,国际调查项目的其他18个高等教育系统中,40岁以下教师的比例均值为36%。我国学术职业人的周工作时间,平均为40.2小时,排在19个被调查系统的第13位,而国际均值为43小时。沈红同时指出,总体平均会掩盖个体差异,比如“985工程”高校正教授的周工作时间就长达56.5小时。

学术职业国际调查:“我们需要中国的参与”

本报记者 郝俊鲁伟

2004年,由美、德、英、法、荷、日的几位国际知名教授联合发起,最后由遍布亚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的26个国家与中国香港地区参加的第二次学术职业国际调查项目在巴黎启动。2004年11月,正参加美国高等教育学会年会的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沈红,受到了项目总协调人、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威廉·康明斯的当面邀请,希望沈红能够代表中国参加该大型国际调查研究项目。康明斯告诉沈红,这个项目由多国学者自发组织而成,因此无法提供任何资金和条件支持。没有钱,还要做全国性的教授问卷调查,沈红看到眼前困难重重,并未一口答应。“我们需要中国的参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对世界高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康明斯的一席话,打动了沈红。沈红回忆说:“我当时觉得,这句话太重了。因为这句话,我就应该义无反顾地答应参加。有再多的困难,日后再努力。”2005年1月5日,“学术职业国际调查—

中国项目”在华中科技大学正式启动。沈红之所以最终接受项目邀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看到中国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2004年,扩招后的第一批本科生刚刚走出校门,处于规模扩张初期的高等教育,开始受到“大学质量下降”的质疑。尚处于摸索阶段的高校扩招,引发各种社会批评。“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如何调整结构?”沈红说,她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通过国际合作,让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与世界接轨,同时,把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教师的发展现状呈现给世界,告诉外界,中国高等教育正在蓬勃发展着。随后,沈红的研究团队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和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2007年秋,项目组进行了对全国11省70所高校4200名教授的全球问卷调查,最终收到来自68所高校的3612份有效问卷。在全球调查中,我国样本数最多,有效回收率最高。沈红介绍,调查样本兼顾了多维度差异:东、中、西的区域性差异的严格分层抽样;“985工程”大学和普通四年制本科大学机构层次性

业”这一概念在中文语境下的定义:具有“以学术为生,以学术为业,学术的存在和发展使从业者得以生存和发展”特征的职业。通过多国比较,沈红认为,我国学术职业人的整体质量和水平,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她认为,我国大学教师的“职业精神和对职业规范、规律的认知还处于较低水平,需要重新建构”。同时,“中国学术职业的管理方式和权力分配,使得学术职业本身内缺激励性动力,外缺制度性条件”。采访中,沈红引述了一则发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典故事:1952年的一天,哥伦比亚大学全校教授为新到任的校长举行欢迎晚会。新校长对到场的“雇员”们表示感谢,一位物理学资深教授却发言道:“先生:教授们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沈红认为,在以学术为重的环境下,大学教授不再是大学的雇员,而是大学本身,这相当于说,学术职业构成了大学。

中国学术职业现状

在多年的研究中,沈红给出了“学术职

差异的严格分层抽样:教师个人性别、年龄和职称等方面差异的非严格分层抽样。调查问卷覆盖大学教师的职业状况、工作情况、教学、研究、学术职业管理和个人情况等六个方面。沈红特别强调,在回收调查问卷的68所高校中,有58所地方高校,10所中央部属“985工程”大学,“严格按照中国四年制高校的地区和所属关系结构进行抽样”。除此,为了使多国比较具有可行性,在对学术职业进行了基础性研究的前提下,特将中国的学术职业调查对象限定为“四年制及以上学制的大学的全日制教师”。截至2010年底,18个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完成了本国(地区)的调查工作,并在德国建成了国际数据库。至此,参与此次学术职业国际调查与研究项目的研究团队,开始基于该数据库,对已有数据的19个高等教育系统展开分析研究。今年11月,作为全球第二次大型学术职业国际调查的项目会议,“影响学术职业变革的力量——多国比较的视角”国际会议首次在我国举行。

校园新鲜事



“奶奶大学生”全正国(左二)与大学室友们在一起

六旬人学堂 全正国追梦

本报记者 高长安 通讯员 张鹏路 戴国辉

“我从小就认为我应该上大学,现在国家给了我上大学的机会我会好好珍惜。”在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就读该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奶奶大学生”全正国对记者说。63岁的全正国,是全国唯一通过高考统招考进大学的高龄本科生。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全正国的家在天津市。由于历史原因,正值花样年华的全正国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但是对于知识的渴求和对大学生生活的向往成了她深藏在心底的一个梦。 2001年,教育改革,高考不再限制年龄。后来,媒体报道了南京的7旬高考生汪侠,当时已经退休在家的全正国看完就动了心思:“老天白给我个挺好用的大脑,都荒废了,可算有个机会让我补回来,我要考大学了。” 全正国的想法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年轻人考大学都那么不容易,一个老太太干嘛受那罪去?

全正国一听就急了,“时代进步了,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老年人难道就只能在天天蹲着,就只能去公园扭扭秧歌跳舞?” 2003年,已55岁的全正国找到天津塘沽一中要求补习。这一年全正国成了一名“奶奶级”高一学生。 2006年,全正国第一次参加高考,考了388分,被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录取。然而,她刚报到入学,强烈的高原反应让她的血压急剧升高。11天后,全正国只好退学。 2007年,她又走进了高考考场,但因为准备不足,最终落榜。 坎坷曲折的求学路,没有让性格执拗的全正国灰心。2008年,她第3次参加了高考,考了446分,被河北理工大学(2010年合并为河北联合大学)录取为本科生。 “奶奶高中生”晋级“奶奶大学生” 2008年9月12日入学那天,全正国从天津塘沽乘车刚到轻工学院门口,就受到了前来迎接的学院领导、老师和数十名学

生的热烈欢迎。 那天的全正国,头发后面扎着两个小辫子,淡淡地化了一点儿妆。 “我们该怎么称呼您好呢?同学,阿姨,还是奶奶?”有个女生问。全正国说:“还是叫我大姐姐吧,我最爱听。”后来,同学们都一致喊她大姨。 全正国在大学与室友之间的沟通显得非常容易。没几天,她就和同学们熟络了起来,一起上课,一起逛超市抢特价品,一起聚餐,和同学们一起看偶像剧,还实行AA制…… 圆了大学梦,全正国的学习劲头丝毫没有放松,每天晚上她都学到11点,宿舍熄灯后,她还要就着床头的充电式台灯再背一小时英语单词。她觉得,国家给了她上大学的机会,她可得好好珍惜。 2010年,全正国获得了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2010年度校园风采人物,被该校授予“校园风采人物——自强之星”荣誉称号。 把不一样的求学之路走到底 大学生生活丰富多彩,但对于学习,全正

中国大学评论

坚守大学精神

郭立场

近日,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网站上登出一篇名为《“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从影星采访,一堂课35人缺席谈起》的文章,作者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庆熊。在文中,张庆熊称,11月10日下午,他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上课,赫然发现教室里空荡荡,“一个学生上来告诉我,因为香港艺人梁朝伟来访,35名武警学员被团委叫去维持相辉堂秩序”,因此请假。张庆熊感叹“复旦世道变了”。 张庆熊在文章中表示,自己愤怒的原因不是这些学生没有事先向他请假,甚至也不是“因为学校团委没有经过教务处同意,没有经过哲学学院的同意,就通过武警班的队长让这些学员不来上课而做与娱乐相关的事情”。他最感到愤怒的,是“团委的相关领导分不清楚教学科研是第一位还是娱乐追星是第一位”。在文中,张庆熊还感慨“复旦的世道变了”。他表示,以前自己总是欣慰于“复旦大学的学生勤奋、聪明、好学,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在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内”,但现在,他觉得,“复旦大学一部分学生把追星、娱乐放在第一位了”。透过“团委组织学生请假护明星”,笔者看到的是弥漫在社会上空的浮躁病。 当代社会各领域出现的浮躁现象波及大学,严重冲击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破坏了大学的学术氛围,我们需要重塑大学精神。事实上,团委举办娱乐活动本身并没错,但如果为了迎合社会流俗而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势必会得不偿失。 大学之为大学,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客观物的出现,更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是追求文明进步的精神殿堂。正因为大学有不朽的精神存在,大学才得以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美国学者布鲁姆在目睹美国大学与社会的过度结合之后,发出哀叹:“大学必须抗拒那种事为社会服务的倾向,作为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大学必须随时警惕自己的利益由于人们的要求而更加实用,更为适应现实、更受大众喜爱而受损誉。”当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迈向社会的中心,其受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丧失了理想主义的大学,从神圣慢慢地滑向庸俗,越来越成为社会中一个普通的服务机构,而不知魂归何处。 大学在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服务功能之时,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应被物利诱惑,被不良风气与思潮吸引,而应始终保持自身独立性和批判精神。大学应摒弃过分专业化的功利主义价值观,遵循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追求真理、创新知识为终极目标。 综观世界著名的、有久远历史传统的大学,在坚守大学本质精神的基础上,无不具有自己独具一帜的大学精神,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博雅之风,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的研究之气,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引领时代潮流的气质,北大的包容精神,清华的严谨态度,这些成为一所大学生生不息的精神之源。 在我国大学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以及功利主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大学的文化精神和高等教育本质受到严重的侵蚀,并进而导致了大学主体性的丧失和大学传统精神与理想的衰落。实际上,这是只关注眼前利益、没有长远眼光的看法,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大学精神的内涵。作为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及知识精英的荟萃之地,大学不应该仅仅成为一个为社会经济输送实用性人才的站台,大学应有它超乎政治经济之外的追求,即发展人(而不仅是塑造人)和生产知识(不仅是技术知识)。大学的发展史已经证明,没有一个无功利的自由空间,大学中的创造活动是无法开展的。所以,大学如果一味迎合市场的现实需要,最终也必然会为市场所淘汰。这无疑是值得警醒的。